

笑貧笑娼的中產階級， 欺貧打娼的北市政府

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

娼良涇渭分明？

台北市府倉促廢娼政策在公娼自救會的密集抗爭後引發社會兩極化的辯論。而當陳水扁動用行政便利公告公娼財產後，痛斥「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論點應運而生。廢娼事件中陳水扁的行政草率過失不再被追究，報章社論轉而援引殘障、老弱者的悲慘處境，對比「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娼妓」，將「貧」與「娼」對立，在慨嘆「笑貧不笑娼」的同時，將道德的高帽再一次重壓在公娼姐妹的肩頭。

嚴批「笑貧不笑娼」的言論，反映的是「笑娼不笑貧」的道德正義。而我們要問的是：這個社會憑什麼「笑娼」？娼妓被污名化，被貶抑到社會的底層，除了讓黑道、剝削更肆無忌憚的直接效應外，另一層間接效果則是將這一群人與乾淨的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娼良涇渭分明。

事實上，最擔心「笑貧不笑娼」的，也正是這一群都會中產階級。他們掌握有利的社經位置，「貧」的存在，適足以彰顯出他們的「不貧」，還可以動用所有納稅人的錢來「濟貧」以表示愛心。因此，「濟貧」的同時也是一種宣告：「我不貧，我容許貧的存在，並接濟他們。」卻不回頭反省：貧、富的差距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裡被「創造」出來的？

這樣的自我彰顯也暴露出另一種急迫性。因為對中產階級而言，娼妓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經濟的，另一方面則是性的。娼妓的性實踐是遠遠超越中產階級的一對一交易模式的。

小心性工作者跨越階級界限

就經濟而言，陳水扁以公布公娼財產的方式作為「公娼靠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有力佐證，一時間，批評公娼「怕吃苦」、「不自愛」的說法交相出現，「可憐的娼妓」搖身一變成「愛慕虛榮的女人」。很顯然的，對社會大眾來說，公娼一個月十萬多元的收入是太高了。那麼，公娼賺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月入十萬才是應該的？陳水扁不也月入數十萬嗎？炒作房地產、股票的人，不也日進斗金嗎？為什麼有少數公娼賺得多（比誰多？）就是不應該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是以房貸、通貨膨脹、逼迫我們拼命工作賺錢、往上爬嗎？為什麼少數娼妓勉強取得了「明顯不是這個階級的人應該賺得到的錢」，就會叫人惶惶不安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在決定誰比誰高尚呢？

失去了「可憐的酒家女」，中產階級的道德良心無處安放，竟轉而祭出似是而非的「社會正義」，為「其他的」窮人代言疾呼：「這些出賣靈肉換取高所得的公娼，又如何面對在工廠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只能賺二萬元的女工啊？……」。女工薪資不合理，應該幫她們爭取更高的待遇才是「社會正義」呀！怎麼反而拿來打壓「高收入」的公娼呢？學歷、技術、人脈都是我們累積「多賺一些」的資源，為什麼只拿女工和公娼比？建築師、律師等領牌的工作，也是高收入呀，為什麼同樣領牌的公娼的高所得，令人側目、甚至不恥呢？說穿了，經濟決定了這個社會主要的階級版

圖，而少數從娼者竟自「貧」中企圖翻身，以其高收入跨越階級界線，恐怕這才是叫安適的中產階級害怕憂心的吧！

從家庭私有制掙脫出來的性勞動

至於性。對「性」充滿恐懼的中產階級最不能忍受性的「溢出」——從婚姻、道德、家庭、私有制中的溢出——而任何謹守的「不溢出」似乎都成了美德，這正是想要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政客要投射的形象。因此主張掃黃廢娼的政客、民意代表、婦運人士們都志得意滿地強調他們個人「重視家庭」「愛護社會」，而支撐他們理直氣壯的，正是整個社會對家庭、對新好男人（愛家的、負責任的、不嫖妓也不外遇的、有事業的）、對新好女人（關心社區安全、譴責色情、保護孩童純潔心靈）的高度認可。相對的，核發牌照給公娼等於是市府公然承認婚姻外的性、將性從家庭的私有制掙脫出來，這無疑是嚴重挑戰新市府的意識型態，於是，最理想的處置方式是：不承認公娼的存在和合法權益。在不承認的同時，還要徹底將她們污名化，以建構粗暴政策的合理性。

當一切勞動力（勞心或勞力）的買賣都被視作「正常」時，唯獨性勞動，卻被賦與羞恥的烙印。對於性——特別是女人的性——的各式規範，正符合中產階級井然有序（誰的秩序？）的世界觀：「正常」的勞資各就其職、「正常」的男女各安其位。無產者可以出賣勞力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但無產的女人若要出賣性，就必須付出受人唾棄的污名代價，以及不被法律保障乃至受盡黑道、警力的聯手剝削之苦。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公權力的行使，共同將性工作者趕入暗巷，迫其隱身噤聲。

不笑貧也不笑娼

中產階級感嘆社會風氣不如自己的理想時總是說這個社會「笑貧不笑娼」，但是，是誰在笑娼？是誰以羞辱迫使公娼姐妹們戴上面罩？不正是那個虛偽的中產階級嗎？公娼抗爭的面罩正是對這個偽善的社會最大的控訴；戴著面罩還是要抗爭，這正是公娼們討生活的理直氣壯。

而理直氣壯的娼妓無疑是叫人不安的。市府救濟方案下，強迫式「從良」的美意竟不被感激涕泣接受！——從良不是娼妓們最大的夢想嗎？我們對娼妓的認識不就是火坑裡暗夜哭泣的柔弱女人嗎？拒不接受救濟的公娼令台北市政府不安，令中產階級不安，面對著理直氣壯的公娼，當然就只有祭出道德性的娼貧對立邏輯來打壓堅持抗爭的公娼了。

為什麼不笑娼就相對的是笑貧呢？公娼抗爭時，立即站過來聲援的正是無產的女人、工人，相互支持的也恰恰是最邊緣的十四、十五號拆遷戶，我們不但沒看到「笑貧不笑娼」所假設的娼貧對立，反而是貧與娼相濡以沫，既不笑貧也不笑娼。而面對這種結盟，出身良好、擁有優勢資源的人立刻以貧的標準來指責公娼救濟金一個月四萬餘是太過優厚（事實上嚴苛的發放資格限定使許多公娼根本拿不到市政府宣稱的四萬餘元），並舉出自力更生的老、弱、殘、女工都安於其困難處境，來對照公娼的「貪婪」；一方面企圖分化這個制度下的弱勢者，另方面掩蓋自己根本就不想徹底改變整個社會體制，好讓老、弱、殘、女工、公娼都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能力和資源，反而粗暴地將「笑貧」與「笑娼」取其一，甚且將自己下意識「笑貧」的價值觀歸罪於公娼昂然不受恥笑的理直氣壯。

以台北市府為首的新都會中產階級的骨子裡，其實正是「笑貧又笑娼」的高姿態，因此掌握公權力的市政府才可以悍然行使「欺貧欺娼」的政策，以迎合中產階級的口味；反正拆遷戶的無家可歸，絕比不上台北市擠身國際的熱切慾望，128名公娼的中年失業，也比不上市政府建立尊貴中產的鐵腕形象。

快樂希望的新城市，偽善而虛矯的台北新市府。